民间采风

还你一个大观园（连载作品）

□ 吴献党

八

坦率地说，有时候，我并不理解我的父亲，甚至有时候感到脑袋炸疼。

我与父亲血肉相连，性情又惊人相似。我应该算是一名知识分子，而父亲大字不识几个。上了年纪，有时候又纯粹像个小孩，说出制裁的话，冷不丁冒出一句，让你捉摸半天，话儿深不可测。

近几年，父亲变成了“上访专业户”。而且缠上了我这个当记者的儿子。

父亲上访，告的是我的一位堂哥。堂哥在村里当书记也当村长。父亲告堂哥是家乡一霸，好恶；告堂哥侵占组里的地盘，建了沙场，破坏了生态环境；告堂哥虚报退耕还林亩数，多领了国家退耕还林款；告堂哥上报的精准扶贫户、低保户，全是任人唯亲；告堂哥侵占国家扶贫款，告组里生态林国家每年每亩19元没有到位。反正，父亲把告堂哥的问题列了一大串。

父亲首先找到他的儿子，问我这个当记者的管不管。

父亲保持着夜间先睡再给我打电话的习惯。父亲的睡眠特好。这一点，令许多人嫉妒。白天，父亲与几位叔叔探讨习近平的“不忘初心”与“中国梦”。父亲的理解是，不忘初心就是当年的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中国梦就是把家乡建设好，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到了晚上，父亲说睡就睡，说睡一个小时就睡一个小时，到时就醒了。夜深人静，我这我刚躺下睡着，他的电话“叮零”打过来，想跟你探讨点什么，你后半夜可能就再也睡不好了。

可这时候你能怎么办呢？

你没有办法，你想睡觉，可他在劳动，在为民请命。

这就没办法了。

老小孩，老小孩，父亲一把年纪，老得胡子都白了，还能活几年，图个什么？我内心深处，对父亲感到纳闷和惊奇。

父亲又来电话了，说习近平一心为农民着想，搞精准扶贫，建设美美丽新农村。下面的人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阳奉阴违，你说管不管，你不管不配当记者，不如回家种番薯。

父亲怒发冲冠，一心要告倒他的亲侄儿。我劝父亲，并下死命令：“要相信组织，要有问题反映，只能一级一级地来，不能越级上访。你非要告，不许找我。”

其实，堂哥的事，我也有所耳闻，有些问题属实，有些问题纯是捕风捉影。

父亲背着我，两位村民带着他，一路告到乡里、县里、市里，告得我心惊肉跳。每次，信访的人接待，见父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又是倒茶，又是装烟，热情备至，劝他在家好好休息，安享晚年，别乱跑了，说要相信组织，好不容易才把父亲劝回去。一次，到市信访局上访后，父亲听说市信访局离报社只十几米远。十多年前，我结婚时父亲来过一次张家界。一晃十多年了，他很想见一见儿子，看一看儿子的单位，可他担心被我责骂，他又胆怯了，不敢去找我。走出大门，站在路边，朝报社的方向，使劲望。最后，随同的两位村民夹着他上了的士，赶火车。

父亲铁心要告倒堂哥。堂哥倒是不怕，依然尽做晚辈的孝心。一次过年，堂哥给父亲送去一袋大米，300元钱。父亲接了，摇晃着钱说：“这下，告你又有路费哒！”搞得堂哥哭笑不得。一次回乡采访，我问一位带着父亲一同告状的村民：“我父亲年纪大了，有个三长两短，咋办啊！”那位村民回答说：“要是你父亲死在告状的路上，不是更有影响力吗？”听完这话，我的心在滴血。

哦，我可怜的父亲，让我心疼而又敬佩的父亲！

去年二月，父亲满90大寿，我回家为父亲祝寿。父亲已不再告状了，因为堂哥被村里一位姓李的妇女告下来了，经纪委查实，开除了堂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职务。父亲像小孩一样，十分开心，喝起了高粱酒，唱起了山歌。

九

父亲不告状了，就像冬天闲置在家里的农夫，不知所措。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父亲平时一般不拄拐杖，却拄起拐杖来了。这对父亲来说，绝对是个打击，因为他一直坚信，自己身体硬朗，还远远不到拄拐杖的时候，再过九年，他要活满一百岁呢。

父亲成了一个孤独的空巢老人。母亲五年前离世，嫁在邻村的大姐两年前病故，二姐和三姐远嫁株洲和河南，我又在张家界上班，家中只有我残疾的大哥。大嫂已病故快二十年了，大哥把两个侄女辛苦拉扯大，都到沿海打工去了。人老了，必须要人照顾。我叫父亲跟大哥吃住，父亲生死不干，执意一个人住在一边。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我给父亲安排个护理，被父亲挡在门外。我只好每年给贤慧的堂嫂五百块钱红包，叫她不时给父亲洗洗床单、被子。父亲虽然拄上了拐杖，但眼清耳明，身体完好。有时大哥出门走亲戚一两天不回家，他还给大哥牵羊、喂猪。家中饮水，全靠屋后的一个岩凼，没有浸水，全凭雨水，遇上天干，饮水便是一个大问题。屋下住的一位堂哥，堂哥门前一个圆塘。堂哥放了十来条草鱼，草鱼不解人意，专往泥巴里钻，往水面上冒泡，把水搅得一团浑，哪管你人畜饮水。也许老人没有瞌睡，也许养成习惯。清早，父亲就起床了。有时对着鹦鹉咀，有时对着大峡谷，打几声吆喝，吼几声山歌，传出回音，更显出山上的寂寥。现在父亲不这样做了，而是拄着拐杖到大凸去看地。家里的地全被大哥种上了，种了苞谷，又种油菜，苞谷和油菜的收成，一年到头能卖个万儿八千，但除去肥料、人工，所剩无几。父亲去的最多的是大塔。大塔是山上最好的一个块地，有60多亩，年轻人全都去沿海打工去了，地荒芜着，好多年没人种，里面的草已长得一人多深。前两年，有老板上山看中了这块地，以每亩300元租下种上杜仲，可嫌弃不通路，种上不到一年，连根拔起，种下山去了。老百姓起火，伤心，有户人家干脆栽上几行杉树，杉苗已有一米多高，歪歪扭扭，长在地头。那户人家扬言，谁想再租咱家的地，都不给！有时，父亲清早就站在大塔，双手按着拐杖，一站就是一个上午，望着几米远的大峡谷发痴、发呆。

做儿子，我不孝，愧对父亲；作为家乡的儿女，我愧对这片养育我的根土。我决定给父亲一个惊喜，给家乡一个惊喜，我计划在山上建成一个美丽的大观园。

去年四月，油菜花儿开了，桃花李花也开了。我带着我的创意回了老家。夜里，我第一次打水给父亲洗脚。父亲的脚干瘦干瘦，我一阵心酸，父亲眼泪流了下来。父亲让它流，没有擦，然后把手一挥：“儿子，走，摆桌子，喝酒去！”

我与父亲喝着酒，把我的创意方案说给父亲听。我告诉父亲，国家把注意力已聚焦到农村，提倡生态美，乡村生态旅游。我们山上有大面积的荒废土地，到处是资源，我们要充分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在山上种上各种花果，让山上一年四季开花，一年四季结果，变成真正的花果山。要种上各种药材，种上西瓜、苞谷、小麦、高粱和时令蔬菜，要设置风车、碓马、水车、磨子、渔鼓铜、三盘鼓等民俗民乐，在鹦鹉咀上设置观景台，在山上设置游道，让游客观赏奇峰石林，让游人徒步穿越大峡谷，还要在大峡谷上建一条索道，让游人走向对岸去，重走当年战天斗地的红旗渠，还要在山上建吊脚楼式的生态客栈。要让游客住得舒适，伸手能摘各种水果，张嘴能吃上五谷杂粮和竹笋、土鸡、斑鸠等山珍美味，去体验悠久的农耕文化。父亲听着，乐得合不拢嘴。我对父亲又说，我们要办的是鹦鹉岩大观园，实际上是国家扶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宗旨是为农民建幸福家园，为市民创休闲乐园。定位是让鹦鹉岩成为农耕文化的科普体验基地、绿色发展的湖南典范、世界遗产的美丽村花，旅游胜地的休闲梦乡。目标是，让鹦鹉岩的乡土气息洋溢心田，让鹦鹉岩景点惊艳世界，让鹦鹉岩的绿色美味陶醉天下，让鹦鹉岩的生态农庄令人向往，让鹦鹉岩村美民富超越小康。这就是我送给父亲的大观园。

父亲估计一辈子没有这样兴奋过，我俩喝着酒，一直聊到天亮。

平凡人生

忆李伯母

□ 卜茂华

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天气晴好，阳光灿烂。我们一行四人，自己开车，由慈利县城去阳和乡。我要去寻找五十二年前即一九六八年八月下旬曾住过三天的一户农家。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不满十五岁，是慈利县一中的初三学生，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三年。我当时是慈利一中的红卫兵，具体工作是卫生员，每天背着一个小药箱，在武斗前线救扶伤员。东方红公社是保皇派，保慈利县委县政府，结果被县军管会宣布为非法组织，给予打击。为躲避抓捕，十几个高中生，外加我，便乘公交车在甘堰乡下车，然后步行二十多里山路，去阳和乡杨家坪村戴家山组朱应雄学兄家小住几日。朱兄是高才生，一九四六年九月生，此时二十二岁，是东方红公社的学生领袖之一，后勤部长。我们一行在山路上走得满身大汗，快到他家时，有二十多个民兵，拿着棍棒弯刀，提着绳子，要绑我们。朱应雄上前和他们交涉，因朱家是贫农，是个大家族，在当地有威望，故他们放过了我们。我们到了他家，是半山腰的木瓦房，门前有个晒塔。朱兄的父母都是农民。朱兄的母亲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她四十多岁，正当盛年，身板笔挺，一脸微笑，十分勤劳，尤其对我们一行，非常热情，每餐开两桌，甑子大米饭，推豆腐，腊肉，各种蔬菜，十几碗菜。当天下午，她蒸了十来斤糯米，给我们做甜酒吃。现在对其他细节不太记得，但她端着撩箕去门前水井冷却糯米饭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天气热，甜酒一个对时便酿好了。第二天晚上，我们便喝上了甜酒。我喝了一大碗，分外香甜。朱兄的母亲还要我多吃点，因为我最小，对我尤为关心。当时，一年到头，人们都很难喝到一口甜酒。那时人们生活困苦，往往家中来一个客人都没有多余的粮米招待。我们这么多人，在朱兄家住了三天，也是好吃好喝三天，朱兄的母亲倾其所有，尽心尽力招待我们。第四天，我们回了县城。以后，劳燕分飞，人各西东，再也没有机会与朱兄见面。但是，与朱兄分别五十二年来，我一直记得他的母亲。尤其自己成人后，想起在朱兄家住的三天，便越发敬重他的母亲。这样的母亲，多么爱自己的儿子，多么大气，多么自尊！她不畏当时的政治气氛，对我们如同她的儿女一样关心，她与我母亲一样，心中有大爱，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是天下母亲的典范。我一直想去拜访朱兄的母亲，向她老人家谢恩。因为我先下乡上山回了桑植官地坪，以后又在深圳工作，而与朱兄失去联系，都未能如愿。今天下决心去，虽然没事先联系，但是我想先到乡政府打听一下，找到朱兄的电话号码和住址。他是名人，应该可以。张常高速很好跑，四十来分钟便到了乡政府，我找到进退伍军人管理站，一朱姓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一说来意，他笑了，说，你找对人了，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朱应雄是校长，退休多年了，住在杨家山村戴家山组。我给你该村的支委妇女主任的电话，她叫罗平，她与朱校长很熟。我马上拨打罗主任手机，通了，她说在杨家坪村部等我。我们到了村部，罗主任上车，很热情，带我们去。原来朱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不一会儿，沿着山间公路，车开到了朱兄门口，罗主任大声喊：朱校长，你家来了贵客，看你还认识不？我进去，朱兄的模样，我一下就认出来了，他认我不出了，我说，我是茂华，他马上反应过来，哦，茂荣茂华，茂荣茂华，卜家兄弟，你们还有两个弟弟。他紧握着我的手：真认不出你了，你那时小，长得好，现在变了。兄弟相见，深叙往事，万千感慨。

我先说我的经历，他告诉我，他在一九六八年也被审查关押过两个月，东方红公社被平反后，他于一九七零年参加工作当教师，以后当校长二十七年。

我告知我家四兄弟的近况。他告诉我他们兄妹六人的近况。他说，后人也很努力很争气。他自己有两儿一女，都在外工作，重庆、长沙。四个孙子外孙，三个在重点大学读书，即将毕业。我听了感到很欣慰，我说，你母亲品德高尚，会教育子孙，大爱大善之人，一定给后人带来大福。然后，我才转入正题，说起五十二年前在他这儿住了三天，我说：你母亲对我们十分客气，倾其所有。我想，当时的环境，生活极其艰难，你家不可能有那么多大米糯米黄豆腊肉，你母亲一定东借西借才能那样好好招待我们。他沉吟片刻，说，我们兄妹六人，我是老大，这里是山村，条件不好，但是我母亲懂道理，她东借西挪，也愿心愿意。他说，我父亲一九九七过世，母亲也已在二零一二年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我说，我来迟了。我要给她老人家磕头去，你带我去。

他带我到他父母合葬的墓前。告诉我，母亲姓李，一九二五年出生，慈利县城关镇园艺场人。

我双膝跪地，双手合十，额头着地，虔诚地给这位伟大的母亲，中国妇女的典范，磕了三个响头，向她老人家谢恩……

春天 汤青 摄

历史影册

武汉、湖北，那些年，那些人

□ 王国庆

一场完全令国人始料未及的灾难——新冠肺炎疫情，自年初始于武汉，继而席卷全国各地。疫灾来得凶猛肆虐，猝不及防，一下搅乱了大众平静安宁的生活常态。

不幸中之有幸，汹汹疫情很快被医学专家廓清迷雾，找准源头，提出对策，中央高度重视，全国各地医护人员紧急驰援，军民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终于，危机渐次平息，守得云开，又见月明。

我一直高度关注着武汉及湖北的疫情。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经和武汉，乃至湖北有过多年的关联和交集。从2000年至2010年，我曾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中支”）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往上的工作对接便是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因而，二十年前，我便和武汉这座城市扯上了关联，每年至少要出差武汉两至三次，有时更多。那时，张家界到武汉没有直飞航班，也无直达火车，既无高速，更无高铁。每次去武汉，都是带车远行，非常辛苦。往往一大早从张家界出发，先走省道经慈利，石门、澧县，然后走国道进入湖北的公安县，再到荆州过长江，然后上汉宜高速奔武汉，再在蔡甸下高速奔武昌，每每抵达武昌下榻的酒店时，已是夕阳西下或灯火阑珊。随着2005年长张高速的开通，我们便改走高速。先从张家界由西往东到长沙北郊，然后转京珠高速，由南向北往武汉。京珠高速（现称京港澳高速）是我国最为繁忙的南北大动脉，每天都是车流滚滚，川流不息，尤其是那些超载超重超体积的大货大卡，如同一座座庞然大物，在繁忙拥挤的高速上或直冲直奔，喇叭声烈，或如蛇穿梭，呜呜咽咽，我们的小车或商务车被挤压在这些大货中间，总是小心翼翼，须臾不敢放松，以至于每次下午三四点到了武汉江夏的凤凰山收费站驰出高速，安全进了武汉，大家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去过武汉N次，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就一个字——“大”，大得令人眩目，大得让人敬畏。前不久，网上有个帖子用大数据极力铺陈“武汉之大”：“时速300公里的高铁绕大武汉走一圈需三个小时；武汉的面积相当于8个香港，4个深圳，11个纽约，5个伦敦，4个东京——”，如今的武汉市城区（不包括江夏、蔡甸、硚口等市辖区）主要由三大区块构成，核心是武昌区，这是武汉乃至湖北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科教中心，几乎所有武汉的大学都集中在武昌的湖光山色中；同时，湖北省市党政机关及中央驻鄂机构也多在武昌，如我们经常“打卡”的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就坐落在武昌中南路，洪山广场旁边。与武昌隔长江相望的是汉口区，那是武汉的商业中心，武汉的大型商场大多在这里，因而也是人流物流最为密集的繁华之地，有“东方芝加哥”之称。今年为全国人民千夫所指的新冠病毒始作俑者据说就是从汉口的华南海鲜市场流出；与汉口隔着一条汉江的是汉阳区，那是武汉的工业中心，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武汉一些老工厂都集中在汉阳，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第一支步枪“汉阳造”就出自这里。

武汉这座超大城市的地理标签很多，如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江南三大名楼之一黄鹤楼，还有蛇山、龟山，古琴台，江汉关和江滩，还有烟波浩渺的东湖南湖，以及东湖边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喻家山下的华中科大，南湖边的中南民大等。除了这些地标，武汉还有一些独特的生活标签。如早餐标配“热干面”，抽烟要抽“黄鹤楼”，喝酒就喝“白云边”，还有毛主席推荐的“武昌鱼”，汉正街的服装摊，吉庆街的鸭脖子等等，这些地域风情，在武汉女作家池莉和方方的笔下，都有着生动而精彩的呈现。

因为公务在身，我每次去武汉都是来去匆匆，短则一天多则三五天，活动范围也大多在武昌，很少跨过长江去汉口，更遑论踏足汉阳。只是2010年秋天，我被分行借调办展，那次在武汉待了个多月，才忙里偷闲去武汉一些地方转悠。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机关基本上是武汉人和湖北人，公共场合他们一般都讲普通话。也许是地域更接近北方，我感觉“鄂普”比“湘普”更接近“京普”。当然，私下场合，这些湖北人更喜欢说家乡话，尤其是主流的武汉话，如地处汉口营管部的那几位我的党校女同学，她们在一堆总是叽叽喳喳满口“汉腔”，加上平时在酒店、商场、公交上耳有所闻，应该说，我对武汉话的辨识度还是较高的。去年底在北京看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影片从头至尾全部是武汉话，尤其是饰演盗车贼的胡歌及饰演陪泳女的桂纶镁居然也是满口地道的“汉话”，甚至一些武汉街头的市井俚语都说得很溜，还有饰演刑警队长的长沙伢子廖凡也是一口粗俗的武汉腔，便觉得特别爽。还看了冯小刚的“只有芸知道”，一部凄美的爱情片，武汉妹子徐帆在里面演一位侨居海外的富婆，她也是本色出演，全部台词都是用家乡武汉话，说得那么地道而自然，没有半点违和感。

从二十年前初识武汉，至十年前与武汉渐行渐远，十年间，我与分行机关那些武汉人湖北人交集不浅，感觉也不错，尤其是2010年借调分行工作的那段时间，大家相处融洽，工作也非常愉快。2010年底我由纪委书记改任副行长，分管工作主要对接长沙，与武汉便渐渐疏离，直到2016年10月，也就是我正式退休前夕，居然还有机会代表湖南省人行系统去武汉参加“领导干部话廉政”演讲比赛决赛，又见到了分行纪委那帮老朋友，他们依然那么热情，那么亲切。

——

在今年这场全民“抗疫”的战争中，武汉和湖北成了“硝烟弥漫”的主战场。习总书记一句话指明“主战场”决胜的方向：“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高度关注武汉和湖北。我也天天在家看电视、上电脑、涮手机，密切关注着武汉和湖北。武汉女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记”几乎每篇都看，我的一位被“封”在汉口家中的中学同学隔三差五和我通电话，告知武汉一线的真实疫情。我时不时会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曾经熟悉的地方和画面，如人行武汉分行附近的洪山宾馆被指定为援汉医务人员休息酒店，洪山体育馆则整体改成了方舱医院；当年办展的武昌光谷附近的武汉会展中心，也被辟为方舱医院；还有那时晚上我经常散步都要路过的水果湖社区，武大、华科大、同济医大、中南民大这些我都曾去过的美丽校园，有的被划为阴霾笼罩的重点疫区，有的成了紧张繁忙的“战时”医院——，在我眼里和心中，曾经生机勃勃，热力四射的武汉，变得寂寥，悲情。

形势严峻。

所幸的是，疫情高峰终于已过，拐点已经到来，胜利的曙光初露。

湖北的漫漫寒冬终将过去。春天已来临，珞珈山依然樱花绽放，东湖水还是那样碧波荡漾。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假以时日，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定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为罹难的不幸者默哀，为病愈康复者庆幸，向英勇无畏奋力逆行的医护英雄们致敬。